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王晚：打开一个女骑手的世界

□ 本报记者 蔡可心 实习生 李雅楠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火了之后，王晚的生活节奏再次被调快。密集的采访让她的嗓音略显沙哑，行程表排得满满当当：上午在济南参加山东大学的读书分享会，中午回老家某县配合纪录片拍摄，不久后再赶往上海。她又变成了“赶时间的人”，只是这次追赶的不再是送餐时限。

聚光灯下，女作家王晚感受到了另一个系统的魔力；聚光灯外，女骑手王晚的世界保持着更为真实的质地。这并不是一份外人眼中理想的工作，在男性主导的骑手世界里，“女骑手”的身份本身就显得有点异类。好在，她有写作。这个原本只是经济意义上“划算的选择”，给王晚带来了意外的名气，也让她将这份职业的尊严与自豪、尴尬与困境悉数呈现——这是一个在算法、系统之外更加复杂和生动的骑手世界。

那就向外走

北京昌平区于辛庄村，是王晚最初跑外卖的地方。这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同跑外卖的，也有吃饭赖账的，在家修行的，这些人的存在常常让她有种“众生平等”的感觉。淡季的时候，她跑出村子，骑到珠江摩尔大厦边上的超极合生汇，这是个大商场。每天，她都要在这座建筑的大穹顶下来回穿梭，像一尾鱼游过钢筋水泥的海洋。

渐渐地，她的电瓶车又冲出昌平到了海淀，甚至从昌平一路向南，一口气到了丰台区的卢沟桥。

王晚的脚步越走越远，而她的原点，在山东老家。由于家里供不起更多的孩子读书，高中辍学后，她开始打工并步入了婚姻。“我不适合结婚。”这是王晚的结论。为了省钱，王晚买了个小电锅用来煮面条。有一次家里没有什么菜了，正当她发愁如何吃饭时，前夫却自己点了一份饺子，没有给她点。

那一刻，她只觉得委屈又心寒。反复的失望，促使王晚选择了离开。

然而，“离异”的标签，让这位女性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大家喜欢共性的东西，不喜欢个性的。个性的东西可以出现在别人家，但是不能出现在自己家。”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好意思出门，觉得女儿离婚是一件丢人的事，二哥也催促她尽快相亲，再婚，尽管他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

“我很不理解，他为什么都不愿了解一下自己妹妹的内心？”为此，王晚一度对二哥失望。

“教皇永远说服不了伽利略，伽利略也没有办法说服教皇。”王晚想到了《世界观》一书，在她看来，每个人的认知体系都像是一幅精心拼凑的拼图，拆掉任何一块，都有可能让整个体系崩塌。“你不能去拆它，只能在原有的拼图上增添新的色彩。”

王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改变不了周围人的认知。就像出版这本书一样，很多人觉得她只是偶然走运而已。

“没必要争辩。世界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跃而过的，而是一寸一寸往前挪的。”于是，当再有人催婚时，她便连连点头：“你说得对，我马上就去找对象。”然后转身继续自己的生活。

“我只想按照我自己的意愿活着。”于是，她决心往外走，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

奔跑中的“超级玛丽”

往外走的十多年并不如意。从印刷工、服务员，到电话销售、网络推广，再到保洁，王晚辗转过17份职业。她甚至试过卖风筝，尽管后来赔了。最后，送外卖成了她最满意的工作，时间自由，挣的也算说得过去，还可以满足她对这个世界始终不减的好奇心。

比如，走在铺满落叶的夜色中，昏黄的灯光打下来，连行人匆匆的身影都有些模糊。王晚却一眼发现一片硕大的落叶，并迅速跑过去捡起来，拿在手里端详。她连连惊呼：“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树叶。”

这份孩子般的心性也融入了她的骑手日常。遇到好看的风光，她会停下来，感受树叶、野花、流云的变换；看见人群聚集，总要凑上前去瞧个热闹。

她说，她喜欢“吃瓜”，吃不明白的时候还会上前去问一问。

因此，跑外卖对王晚来说，身体上的疲惫远超过精神上的压力。在这背后，是无数个具体而细微的挑战。

每天出门送单前，她都会先去村子外面的换电站换个电瓶。一块电瓶少说有10来斤，稍微重些的将近50斤，每天至少更换四次。有的换电柜接口设计过高，需要将沉重的电瓶高举过头顶，每次完成这个动作，她的身体都会止不住发抖。

上厕所更是需要精心规划。她总结出三个选择：小树林、市政公厕和商场厕所。有一天晚上，她蹲在别墅区树林子角落里，差点被保安当作小偷，吓得她再也不敢在小区里上过厕所。

除了与保安斗智斗勇，她还要与交警周旋。遇见保安她不怕，但交警就不一样了。为了抢时间，不少骑手会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对王晚来说，有时候逆行是不自觉，有时候却是不得不逆

行，不然就要绕路，多跑两三公里。跑外卖后，她深切体会到一些基础设施的设计并不合理，比如需要上下推行的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坡度又大宽度又窄的斜坡常常让人两眼一黑，即使慢慢推着车子，也会出现连人带车从台阶上滚下去的惨状。

系统限制的送单时间越来越短。于是，她一次又一次选择冒险。身体和电瓶车上的配件一样，时刻经历着磕碰。

送外卖让她变得紧张和焦躁，担心超时，担心餐品被偷，担心送错地方。哪怕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她也时常担心车子是否被雨淋坏，有没有被人扎了车胎，系统会不会不认识自己。因为账号等级往下掉，也就意味着她的同时接单量会下降。

时间久了，王晚开始幻想自己是在玩一场限时游戏，“像游戏里的超级玛丽，每丢一单，就能从头顶的墙上撞下来一个金币。”

属于女性的考验



送餐途中的王晚。

刚入行时，王晚几乎看不到女骑手的身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骑手这个群体正在快速壮大。可以说，每一位女性骑手背后，都有一个在有限选项中奋力打破性别边界、争取生命主导权的故事。很多女性选择这份工作，是因为它能够与育儿、家务等传统责任在时间上兼容。

这仿佛是一种矛盾中的进步，她们的确获得了经济自主的空间，却正在付出更多沉默的代价。

身为女性，王晚的骑手生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面对更多无声的考验。

比如阴雨天发霉的内衣，又大又沉不适合女性佩戴的头盔，以及彻底紊乱的经期。为了身体，她大夏天也只能抱着热水喝。高峰期跑单，热汗和冷风混在一起被吹进肚子里，子宫里、肠胃里。骑车时，她只能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把着车子。冬天穿得厚，而商场的暖气足，取暖又绕，一圈下来，她穿着透气的贴身衣物跑出商场，再冲进室外的冰窖里。冷热交替间，她竟也摸索出一套生存法则：什么样的温度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多快的速度取餐，取几单能保证不出汗。

更让人疲惫的，有时是周遭的眼神。在这个男性占绝对多数的行业里，她不断被问及：“女的跑外卖累不累？”“跑得动吗？”“赚得多吗？”她分不清这是关心，还是猎奇。

更直接的声音是：“这活儿不该女的干。”连同她的写作，也一并被置于放大镜下审视。评判无处不在，用她的话来说，“爹味儿太重。”

困扰她的，还有对故乡的情感。在北京，她感到自己有点像“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知道租住的小屋何时就会被清退。在老家也一样。那里没有王晚的房间，有时候回去没地方睡，她只能打地铺。

“哪里都没有你的家，没有你的地方。”这种悬浮感让她觉得，住在哪儿都无所谓。有时候，她也羡慕老家同学安稳的生活，但那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

“在看到幸福的时候，我会想到它痛苦的部分。”

六年级的时候，父亲出事，她的成绩一落千丈。母亲认为读书改变不了命运，早点工作，嫁个好男人才是正途，于是让她辍学。多年后回过头看，王晚选择了理解母亲。“她认为那就是最好的出路，最轻松的人生。其实她也在试图给你最好的东西，但她的认知就在那里，没办法把你托得更高。”

可以掌控的人生

在中国，超过一千万外卖骑手穿梭于城市脉络之中。他们常被贴上“艰辛”“苦情”的标签，却鲜少有人看见头盔之下一个个鲜活迥异的灵魂。抛开被凝视，他们都是靠双手打拼的普通人。

坚韧，也潇洒；奔波，也自由。当这个庞大群体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一种独特的“体验式观察”也随之兴起，不少人为了深入了解他们的处境而尝试体验骑手生活。王晚也曾被质疑，“你是不是为了写书，才去体验外卖员生活？”

这让她有点气愤，觉得是对自己工作和写作的双重否定。对她来说，送外卖不是体

验而是生活，写作也不是抽离的观察，而是生活的自然延伸。“如果把生活、工作跟写作都区隔开的话，会很痛苦。”

在她眼中，每个骑手都在构建着自己的小宇宙：电瓶车上挂满玩偶的，耳机里循环着摇滚乐的，赚够钱就回家“躺平”的，为了省流量在路边静坐发呆的……在这些看似单调的奔波里，每个人都守护着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

王晚也不例外。即便在跑外卖的过程中，她也没有忘记读书。她曾在外卖箱里放了一本余华的《活着》，但没有时间让她停下来看书，直到一场大雨把书淋成了一块纸，她才放弃了带着书跑外卖的念头。

“如果活得太自我，别人会把你当成非正常人类，当成变态。”一些像膏药一样贴在身上的标签曾让她觉得，接纳自我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王晚也一度羞于提起自己的骑手身份。然而，恰是这份工作，让她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当许多人将跑外卖视为底层与艰辛的象征时，王晚在其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独立。这份风里来雨里去的工作，让她感到平静和满足，成了她“可以掌控的人生”。

“哪怕今天我的账户上只有一块钱，只要明天我能接着干，我就能养活自己。”

按照王晚的计算，此时写作也是一件“很划算”的事。冬天是外卖淡季，收入会随着之变低，如果新书出版，则会有钱弥补这个亏空。但若追问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动力，比如兴趣、梦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在潜意识里，王晚也觉得，或许这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事情。

“让自己的人生变好一些，我一直试图在做这件事情，让自己看起来更体面一些，有权利跟别人说不。”

为沉默者发声

大多数时候，王晚只是闷头接单，不常主动找人说话。但奔波途中遇到的很多意外，常常让她不吐不快。比如被吐痰、被司机故意别车，被突然的喇叭声吓得一动不动。“写作也可以说是情绪宣泄，有一些东西，我想讲出来。”

这些艰难，无论是身体的，环境的，还是情感的，她都曾犹豫过是否要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后来她决定还是要“赤裸地去写”，因为只有“赤裸地去写”，才能让别人真正看到底层女性在经历着什么。

对她来说，写作也是一个自我观察的过程。跑外卖的时候，她时常想象自己的灵魂飘出躯壳，飘到电瓶车的上空，静静地观察她与这个世界的连接：如何送餐、如何与顾客接触、如何短暂地融入又迅速地退出他人的生活。

王晚曾接过一个单子，按照系统的规划，单子很快就能送到。但系统并不知道实际情况，根据现实路线接单的话需要绕行很远。订单送达后，她向客服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可以获得距离补偿。客服表示已完成的订单无法补偿，但会向技术部门反馈，合理规划路线。

再次看到类似单子时，她注意到系统给出了新的路线。最后，王晚没有拿到应有的补偿，但她依然很欣慰，因为如果有人接到那边的单子，至少他们可以拿到本应拿到的钱。

写作对于她来说也是如此。从办健康证，到如何认证、如何线下培训，再到如何绑定银行卡，王晚用亲身走过的弯路和获得的成长，写下了这本实实在在的“骑手观察手记”，光是出版之前的废稿，就已经堆了十万字。“一定要讲清楚，”王晚说，“要考虑到有些人在这本书的时候，是真正想靠这份工作活下去的。”

王晚的大哥也是一名骑手，一次被车撞伤后，竟连去医院挂号的流程都不懂。那个时候王晚突然惊觉，这个世界一直在飞速转动，制定着各种规则，但有些人仿佛被永远留在了围墙之外。

他们不该被丢下。

“既然能有机会发声，能有机会把声音传递给别人，那就不要用来炫耀才华或技能。这不重要。”她说，重要的是替无法发声的人发声。

新书上线那天，王晚正在听一首歌，是海来阿木的《西楼儿女》。听着听着，她突然大哭起来。“以前我一直问着头往前走，那一刻突然回头看了一下自己的人生，才发现原来走得那么曲折。”

如今，外界的关注并未改变王晚对自己的认知，未来也不一定非要绑定“作家”的方向，她认为，人生应该过得更有意思一些，或许攒些钱，开个煎饼铺子也不错。

“即使我的书不出版，我还是会继续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度过这一生。”王晚说，“可能还是很辛苦，但没有关系。哪种生活不辛苦呢？”

面孔



赵莉：

为石窟壁画找回失落记忆

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的悬崖峭壁间，赵莉对着斑驳壁画仔细观察。一个切割痕迹，一抹褪色颜料，都可能成为她寻找流失海外壁画的线索。这样的追寻，她已坚持了三十二年。

大三时，赵莉被一则关于龟兹石窟的科教片深深吸引，于是毕业后主动申请来到戈壁深处的克孜尔石窟。初到时，她坐在毛驴车上忍不住哭泣——土坯房、饮用水困难、野兽毒蛇，现实远比想象艰苦。

更让她心痛的是洞窟里的累累伤痕。20世纪初，多个境外探险队从这里掘取了近500平方米的壁画，涉及59个洞窟。她下定决心要找回失落的壁画。

2002年，赵莉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第一次亲眼见到流失海外的龟兹壁画。回国后，她开始自学德语，十年磨一剑，终于在2012年重返吐鲁番，用一年多时间对包括克孜尔石窟壁画在内的4594件新疆文物进行测量记录。为了赶时间，她常常从开馆工作到闭馆。

相比收集资料，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壁画回归原位更具挑战。她需要熟读佛经以考证壁画题材，牢记每个洞窟的细节，在电脑上将拼接错误的壁画反复拆分、组合。有时一觉醒来，脑海中突然灵光乍现，某块壁画的正确位置就被找到了。

这样的灵光乍现，背后是三十多年如一日的坚守。她白天上洞窟，晚上读佛经，数不清在悬崖峭壁间穿梭了多少趟。在她的手机中，克孜尔石窟一点点找回了失落的记忆，而那些跨越百年、散落世界各地的壁画碎片，也终于踏上了归家之路。



毛洪京：

看见算法与亲情间的鸿沟

知名睡眠障碍专家毛洪京医生在一年前上线自己的“AI分身”时，或许未曾料到，这个数字工具会成为一座桥梁，连通无数失眠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

650万人次的年度咨询量，印证了需求的庞大。然而数据背后，是一个个体与挣扎的生命。其中一位年过七十的老人在两个月里，向AI发起了上千次深夜对话。在持续的“树洞式”倾诉中，一个因家庭变故而崩塌的睡眠世界逐渐浮现：妻子患癌，他日夜照料，忧虑成疾；妻子离世后，失眠未愈，与女儿的关系却降至冰点。于是，本该由亲情承接的温暖，最终竟由一段程序勉强维系。

毛洪京曾评估，AI分身能达到他本人50%的专业水准。但即便能力达到100%，AI终究是工具。老人的困境，折射出一个愈发普遍的社会问题：在老龄化加剧的时代，无数老年人正独自进行着与慢性病的拉锯战。他们的子女，或因奔波忙碌，或因情感隔阂，难以及时察觉父母身心状态的细微变化。老人们常因“不想添麻烦”而选择沉默，子女们的关心则容易流于口号和形式，直到小问题堆砌成大麻烦。

如今，毛洪京的AI智能体依然履行着永不熄灭的问诊职责。它高效、稳定、触手可及，但永远无法替代亲情的拥抱。在算法与亲情之间，依然横亘着一段无法被代码连接的鸿沟。



赵安：

当努力成为一种信仰

三年前，赵安因博士论文致谢意外走红。在那篇题为《可怜无数山》的文字里，人们读到一个普通人的十七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历经7次考研，3次博士答辩，其间辗转多家农业企业打工维生，曲折艰难难以尽述……他以肉身之韧，一次次撞向命运的城墙。

一个靠努力挣脱出身枷锁的人，最终赢得编制、教职、家庭，完成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闭环”。然而光环背后，是长期伴随的焦虑、失眠，以及对失败近乎本能的恐惧。喧嚣中，赵安选择转身回归平静。她婉拒了更多关注，回到兰州大学成为一名教师，埋头学术。从“追逐光”到“成为光”，赵安在教育中找到了比个人成功更深的使命。他用前半生走出大山，用后半生回到大山般的坚守中，去照亮更多如他当年一样迷茫的年轻人。

从黄土高坡的窑洞到北京博士答辩席，再到兰州大学的讲台，赵安仍在努力。只是他如今的努力，不再只为挣脱过去，更为了照亮他人的前路。他的身上凝结着一代人的精神图景：背负着出身与时代的重量，不得已在夹缝中奋力前行。如果他们信仰，努力一定是其中重要的一条。（□记者 蔡可心）